
日本民主党安全战略走向初析

杨伯江

内容提要：在经历了一年多的“政权试用期”后，民主党的执政思路出现重大变化，对外战略的现实主义、实用主义色彩趋强，安全、军事因素在对外战略中的占比上升。鸠山、菅两届内阁的政策演变、新《防卫计划大纲》及其形成过程的台前幕后所体现出的民主党安全战略，较自民党时期更具进取性、更为积极外向。巧用日美同盟、提升独力防卫能力及构建“民主安全网”，是日本维护及扩张安全利益的三大基本手段，其中提升独力防卫能力是主线。日本安全战略的此番调整反映了近年来其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是各方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鉴于主要促变量如国际战略力量对比的变化等预计将持续发展，今后一个时期，这一调整将继续朝着“进取”、“积极”、“外向”方向不断推进。新《防卫计划大纲》的出台，标志着民主党执政以来的“安保论争”暂告一段落，但同时也预示着日本更高层次战略调整的开始。

关键词：民主党 安全战略 日美同盟

作者简介：杨伯江，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中图分类号：D7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 (2011) 02-0027-13

一 从“拼外交”到“拼安保”

民主党上台执政以来，对外战略实施重点明显从最初的“战略性外交”转向“创设型安保”，曾经的自由主义、理想主义色彩昙花一现，迅速让位于保守主义、实用主义。

（一）民主党曾构想“外交立国”

民主党2009年9月取代自民党执政后，继续坚持对政治大国化目标的追求，但就实现目标的途径选择，提出了不同于自民党的“新思维”。面对新兴大国崛起、战略力量对比变化，从自民党政权后期开

始，日本一直为如何能立于不败之地、赢得全球大竞争而苦心孤诣。^①民主党上台之际就此秉持的看法是：日本今后不能继续全靠经济说话了，要维护乃至提升国际地位，只有靠“拼外交”，即加大外交手段的运用力度，提高外交对拓展国家利益的贡献度。用民主党核心智囊人物须川清司的话说，中国 GDP 坐三望二，日本被赶超已近在眼前，日本经济沉沦可能难以避免，但国家的没落并非不可避免，关键是能否有成效地推进战略性外交。外交拙劣是导致日本近年来国际影响力下降的关键因素，强化自主思考、奉行“智慧外交”是未来日本的出路所在。鉴于日美同盟的有效性、可靠性下降，日本外交需要进行多元战略选择，紧扣国家利益，发挥自身优势。^②

首任民主党政权、维持了近九个月的鸠山内阁在其前半期将此“拼外交”思路发挥得淋漓尽致，形成了西方媒体所谓的“鸠山冲击”：（1）对美要求平等独立，提出修改普天间基地搬迁方案，调查日美“核密约”，修订驻日美军地位协定等多项议题；（2）提高“东亚共同体”构想在对华战略中的定位，在借邻发展的同时偕邻自重，增加对美筹码；（3）停止在印度洋为美军补给的同时，对阿富汗、巴基斯坦尝试“出路外交”，探索为平息国际安全热点独立发挥作用；（4）高调展开减排外交，提出以 1990 年为基准，至 2020 年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削减 25% 的“不可能的目标”。此外，对改善日俄关系、突破日朝关系，也显露出积极进取姿态。

（二）鸠山内阁后半期开始“转向”

至 2010 年初，鸠山内阁支持率从最初的 70% 多锐减约六成，日本各界形成反“鸠山冲击”风潮，其“战略性外交”的主要卖点均引发质疑与抨击。与偏激刻薄的右翼保守派论调相比，主流媒体“中道”战略精英的评析似乎更言之成理，也更具杀伤力。这部分势力加入批判阵营本身，就足以说明对“鸠山冲击”的反弹已经相当普遍。譬如，其代表性人物、曾任福田康夫首相高参的五百旗头真，先是归纳出“鸠山冲击”的三点理论依据，进而逐条加以批驳。

① 参见杨伯江《国际权力转移与日本战略回应》，《现代国际关系》2009 年第 11 期，第 26～27 页。

② 须川清司『外交力を鍛える』、講談社、2008 年。

五百旗头真认为，如果鸠山内阁试图改变以日美同盟为基础的对外政策，其依据不外乎以下三点。其一，在当今全球化日益推进、相互依存的时代，国家间可以通过和平交易获取所需。日本应重估或改变靠军事力量维护安全的旧思维。其二，日本战败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仍依靠美国保护安全有损民族自尊。鸠山一郎前首相就曾说过，将来日本修宪、重整军备后，应要求美军撤走，实现对等的日美同盟。其三，美国单极统治时代结束，中国实力越来越强。为应对这一新局面，日本应改变对美一边倒的做法。

然而，关于其一，“在当今世界，需要借助多元化多重性应对措施，即使在相互依存的趋势下，也不能在安全保障措施方面有所懈怠”。一国“无论软实力多么出色，如果自己不具备防范各种威胁的能力，那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一般国家都不会玩弄战争游戏，但遗憾的是也有不守规矩的国家”。日本周边就有“炫耀其核武器和导弹能覆盖日本的国家”。关于其二，“日本一直坚持专守防卫、不拥有高价进攻性武器，军费对 GDP 占比还不足 1%（英国、法国、德国均为 3% 强）”，面对邻国的威胁，目前还没有做好大幅扩军的准备。实际上，“最大的资产”还是“可靠的日美同盟”。关于其三，“美国的实力确实因伊拉克和次贷危机而受损，但美国的特点是能够在自由和多样性的背景下很快恢复元气”。“虽然中国的 GDP 已经与日本相当，但美国的经济规模是日中之和的三倍。”特别是军事上，美国具有明显优势，“其他国家即使花上十年也难以企及”。而反观中国，“虽然拥有强大的政治实力，但要想成为让世界信赖的领导者，还需要解决国内民主化等诸多课题”。^① 还有多位战略专家持相同或近似观点。如白石隆认为：日本外交安全战略“首先要坚持日美同盟。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地区安保体系是保证东亚稳定的基础”。“如果放弃日美同盟，那么可以设想的最坏局面是美国把驻军撤到关岛和夏威夷一线，对日俄中采取平衡姿态，即采取‘隔岸观火战略’。届时，日本为增强防卫力量，势必要投入远远高于目前的巨大资源。”“而一旦日本迈出增强防卫这一步后，中国必然进一步加快扩军步伐，韩国、越南也将紧随其后。如此一来，

① 五百旗頭真「日米同盟こそ外交の礎」、『日本経済新聞』2010 年 1 月 6 日。

资源分配的重点就将从经济增长转向防卫。”“要防止出现这种局面，就必须维护美国对东亚的军事参与。”^①

与此同时，民主党政权提出的“东亚共同体”构想被同步否定。一方面，该构想是与日美“对等”的要求同时提出的，其冲击力由此被放大，也由此被置于日美同盟的对立面，使二者处于相互竞争、相互排斥的关系，反对“削弱日美同盟”导致对“东亚共同体”构想的敌意。另一方面，鸠山内阁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并没有从亚洲邻国那里得到预期的热烈回应。甚至据右翼保守势力称，不仅是日本国内，东南亚国家特别是越南、印尼、新加坡和泰国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担心日美同盟瓦解，害怕美国从日本撤军，中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进一步增强”。^②

（三）政权更迭，“拼安保”提速

重压之下的鸠山内阁急于摆脱“轻同盟、轻安保”形象，加快了《防卫计划大纲》的修订进程（此前美国研究界曾盛传，日本新大纲的出台可能再度延期至 2011 年）。以 2010 年 2 月政策咨询小组——“新时代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恳谈会”成立为契机，民主党安全防卫政策开始大幅调整。^③在恳谈会首次会议上，鸠山首相指示大纲的修订要着眼于应对周边国家军事力量的现代化。同年 3 月韩国“天安”号事件后，日本国内“朝鲜威胁论”再度大幅升级，不仅成为压垮鸠山政权的最后一棵稻草，还导致后任的菅内阁推迟发布年度《防卫白皮书》，以重估安全形势、细化威胁因素。^④4 月，民主党政权发表执政后的首份《外交蓝皮书》，对日本的安全性判断颇为严峻，基本重复前自民党政权对周边安全威胁的判断与描述。

2010 年 6 月，菅直人在接任首相之际提出，“对中国正在增强军力一事必须给予严重关注”，就“天安”号事件表示“亚洲局势高度紧张，美军正在发挥威慑作用”。7 月参议院选举时，民主党政权公约提

① 白石隆「東アジア協力のルールを」、『読売新聞』2009 年 11 月 1 日。

② 中西輝政「日米同盟空洞化がもたらす日本の衰亡」、『正論』2010 年第 3 号。

③ 「防衛大綱見直し、『なし崩し』は避けねば」、『東京新聞』社説、2010 年 2 月 19 日。

④ 「私が判断した」、『読売新聞』2010 年 7 月 29 日。

出的外交、安全政策主张，与安倍晋三内阁、麻生太郎内阁相差无几，突出强调深化日美同盟，而在提及制定新大纲及中期防卫计划时，主张与澳大利亚、韩国、印度等推进防务合作。9月，菅内阁发表民主党政权执政后的首份年度《防卫白皮书》，强调美军驻日的重要性，并首次提出中国的相关动向已经成为“地区和国际社会的担忧事项”。10月，菅直人在自卫队阅兵式上高调宣讲中朝威胁，称“朝鲜正在积极研发导弹和核武器，中国正加速推进军事现代化，海上活动日趋活跃，日本所面临的周边环境日益严峻。面对这种变化，自卫队有必要加强实效军力予以应对”。

二 民主党“转向”的台前幕后

从鸠山内阁到菅政权，安全、军事要素在民主党政权对外战略中的定位明显提升，安全关注也从“九一一”事件后强调“多样化威胁”回归而集中于传统地缘安全威胁，这是各方面因素累积叠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外交挫败及安全环境变化，促民主党改弦易辙

民主党政权对日本对外关系的结构性矛盾估计不足，“拼外交”连遭挫败，这促使其调整思路。而内外压力的高度一致性、指向性，又决定了这一调整的方向性：调整不是沿着如何改进“战略性外交”的思路向前走，而是迅速从“外交”跳到了“安保”。民主党政权开始认识到，对外战略的推进“不仅要用嘴巴（外交），还要依靠牙齿（安保）”。^①

首先是对美外交。民主党上台伊始就要求修改普天间基地搬迁方案，坚持基地“必须迁到县外乃至国外”，以及调查日美“核密约”，引发了美国民主党政府的“战略忧虑”，两国关系陷入冰点。而鸠山首

^① 民主党少壮派安保团队代表性人物长岛昭久对华政策的主张具有典型意义：“面对崛起的中国，虽然需要以经济手段为中心努力予以接触，但终究需要在安全上做好对冲的准备。譬如，为应对中国不断增强的拒止（anti-access）能力，作为一种平衡，日本需要准备能将其抵消的相当的力量”“这远不是靠一国力量能单独完成的，日本需要与美国共同努力、或者与美韩共同努力、或者联合美国的亚洲盟国。日本需要在这些框架内努力尽责。”参见：长岛昭久「アメリカの実像と日米同盟」、『外交』Vol.2、時事通信出版局、2010年10月。

相最终迫于压力向美国低头，则不仅使普天间问题在历经八个月的外交博弈后重回原点，以美国的胜利而告终，同时也宣告了民主党对美“对等外交”的破产，鸠山内阁威信大挫。^①

其次，从周边外交看，一是鸠山内阁突破日朝关系的策划未见进展，相反，随着日韩对朝政策协调的加强，日朝关系跌至新低。鸠山首相上任之初曾对朝采取灵活态度，在对朝政策上“希望展现出被认为与以往不同的方向性”。据传，他曾有意仿效前首相小泉纯一郎访问平壤，改善日朝关系。但鸠山政权后半期对朝政策明显趋硬。“天安”号事件后，在真相尚未查明的情况下，日本急不可待地强烈谴责朝鲜“击沉”“天安”号的行为。在民主党内对朝强硬派坚持下，被朝鲜谴责为“民族叛徒”的原朝鲜劳动党书记黄长烨、被韩国认定为 1987 年大韩航空 858 客机爆炸案主犯的朝鲜前特工金贤姬，先后在 2010 年 4 月、7 月被安排访日。内阁公安委员长中井恰表示，日方此举的意图是想借此“更多了解有关日本人被绑架到朝鲜的事件”，但这类举动对朝鲜的刺激、对日朝关系的破坏作用显而易见。二是日俄关系重陷僵局。2010 年 7 月，俄罗斯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之一的择捉岛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11 月，俄罗斯领导人又登上另一岛——国后岛“视察”，日俄领土争端升级，对抗情绪加剧。三是中日关系。由于民主党政权放行“三独”代表人物窜访日本，鸠山首相在巴厘民主论坛公开置喙中国内政，中日深化合作进程未能如预期的那样顺利。而随着日方圈海动作加快，中日之间海洋争夺、安全对抗意识上升，2010 年 9 月 7 日钓鱼岛事件后，中日摩擦升级。

此外，地区安全热点反复发作，再次为日本强化安保态势提供了外在驱动力。东北亚地区形势复杂，矛盾盘根错节，朝鲜半岛与日本近在咫尺，朝鲜又是日本至今尚未建交的唯一国家，半岛局势、日朝关系向来是影响日本安全政策的重要外部因素。早在 1998 年，朝鲜发射“光

^① 2010 年 5 月 28 日，日美两国就驻日美军普天间基地迁移问题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将把基地迁至冲绳县名护市美军施瓦布军营周边，其核心内容与 2006 年自民党政权与美国达成的搬迁方案相同。同时，鸠山首相罢免了坚决反对 2006 年方案的内阁成员、社会民主党党首福岛，社民党随即宣布退出联合政权。6 月 2 日，鸠山首相宣布辞职。“普天间交涉”失败对鸠山内阁打击甚重，日本选民对民主党政治的“不信”、“不安”上升，在随后的参议院选举中，冲绳选区投票率创下历史新低。

明星1号”卫星^①，日本旋即决定与美国联合研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此后，朝鲜历次核试验、导弹试射及半岛局势的紧张都成了日本右翼保守派、强硬派得势进而整军经武的契机，如2006年安倍晋三而非福田康夫接任首相、2009年麻生内阁支持率的回光返照，等等。2010年发生的“天安”号事件、朝韩炮击事件，直接影响了民主党内部权力斗争的走向以及年度《防卫白皮书》、新《防卫计划大纲》中的有关安全战略的判断。

(二) 与民主党、日本政坛权力结构同步变化

党内存在新老矛盾，“左”“右”矛盾是民主党先天固有的结构性问题。民主党上台执政以来，在这两对矛盾的激烈角力中，优势明显在向“新”、“右”方面倾斜。一是鸠山首相辞职、小泽一郎官司缠身，以此为标志，民主党老一代“三驾马车”权力结构不复存在，权力的年轻化加速发展。二是“拼外交”思路碰壁、地区安全热点发作催生了日本政界新一轮“强化安保”氛围，右翼保守派、强硬派的政策主张顺风得势。民主党少壮派安保团队的权力地位上升，对核心决策圈的影响逐日加强。菅直人内阁成立后，少壮派安保团队代表性人物、防卫大臣政务官长岛昭久等频繁放话，一边试探各方反应，一边为安全政策的调整定调，对菅直人首相的决策起到了引领作用。

少壮派权势上升及鸠山下台的前车之鉴，使菅直人首相原有的政治理念、政策主张遭到“绑架”。加之，反对修宪和放弃“武器出口三原则”的社民党退出联合政权，7月参议院选举社民党及日共得票率与得票数下降，下野的自民党为吸引选民而刻意突出本党“保守本色”，从自民党分蘖出的新兴小党对外多持保守强硬立场，整个日本政坛形成了一种有利于“强化安保”、政策强硬化的态势。其结果，2010年底出台的新《防卫计划大纲》，除解禁武器出口被“缓期执行”外，从安保理念到具体政策，几乎原封不动地体现了少壮派安保团队的主张。

从更深层次看，“强军”一直是日本政治大国战略的题中之义。该战略虽经2005年“争常”失利而受挫，但战略本身并未被放弃。2010

^① 当时，美日韩都坚称朝鲜发射的是“大浦洞”1型弹道导弹，射程2000公里，并认为朝鲜这次发射未取得成功，第三级火箭爆炸后坠入日本东北方向约580公里的太平洋中。

年 7 月参议院选举中，民主党、自民党在各自的政策纲领中都将“争常”放在重要位置。日本政界各派之间的分歧在于：为实现这一目标，作为路径选择，是与亚洲合作多一些还是依靠美国多一些，是使用经济外交手段多一些还是使用军事安保手段多一些。“是否把军事手段作为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主要手段，是区分强硬保守派与温和保守派的一道分水岭”，而在鸠山内阁前半期，“后者明显在民主党政权中占据优势”。^① 2010 年以来民主党政策的调整表明，日本欲借重亚洲、借助经济外交手段来实现自我发展的思路退潮，在一派眼里“可资利用”的周边邻国，瞬间成了另一派整军经武的口实与防范对象。

（三）与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共振

2001 年“九一一”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将国际反恐置于战略首位，反恐主题覆盖了小布什八年任期的大部分时间。在此期间，东亚地区形势发生两大重要变化：一是主要国家力量对比持续演变，中国和平发展势头全面展开；二是区域合作方兴未艾，东盟“10+3”框架进一步成熟，中日韩三边合作走上正轨，从 2008 年开始每年举行独立于“10+3”框架的三边峰会。从小布什政府后期开始，美国意识到“反恐得不偿失。两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恐怖主义有增无减，伊斯兰世界普遍有屈辱感，而中国却在快速发展”。美国“似乎如梦初醒”，政府、军界和智库开始进行战略反思并逐步形成共识：“反恐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有结果；美国不能因为非传统安全而忽视传统安全问题。”于是，美国着手战略调整，“从反恐战争中脱身，把战略重点移向美国传统安全的中心，即西太平洋地区”^②。美国重返亚太，使本地区形势更趋复杂，大国战略因素陡然上升，也直接影响了日本安全战略的调整。

出于维护地区“均势”的需要，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一个“更强有力的日本”。在小布什任内，美日曾围绕对朝政策出现严重分歧，美国不顾日本利益和安倍内阁的反对，坚持为朝摘掉“支恐”帽子，使美日互信受损。奥巴马上台后，对日转而采取重视与协调姿态。

① 参见杨伯江：《民主党新政与日本之“变”》，《外交评论》2009 年第 10 期，第 14 页。

② 郑永年：《中国的亚洲安全困境及其选择》，<http://qiusuoge.com/6305.html>。

2010年2月，美国国防部发布新《四年防务评估报告》（QDR），一方面在普天间基地搬迁等实际问题寸步不让，坚持按2006年方案办，另一方面则突出强调美日、美韩“紧密的同盟关系”的重要性。2010年，美国在东亚借安全热点题材反复炒作，与盟国、友邦频繁联合军演，积极撮合日韩进行安全军事协调，推动日本参加美韩军演、韩国参加美日军演。2010年9月，驻韩美军司令夏普在美国国会听证时表示，（美国军方）“为了建设韩美日三国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正在尽一切努力”。

美国出于地区战略需要而采取的此类“纵日政策”，无疑鼓励了日本民主体权内亲美派、强硬派、少壮派“安保团队”与其同步跟进。借此调整，日本首先是要抓住美国“重返亚太”的机遇，借船出海，在安全政策上进一步自我松绑，在军力建设上自我强化。在小泉任内，日本就曾利用美国“反恐至上”的有利时机，通过多项“有事法制”，大幅强化了自卫队参与海外军事行动的自主裁量权。其次，日本要显示其作为“紧密的盟国”，仍有力量配合乃至支撑美国的此番战略“重返”，进而以巩固的日美同盟框架为凭借，推动与美国的其他区内盟国、友邦构筑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网。

三 维护安全的三大支柱

以新《防卫计划大纲》出台为标志，日本民主党的安全战略完整亮相。它在安全理念上主张奉行“积极和平主义”，使日本成为“和平创设国家”，军力建设上提出“动态防卫力量”概念，战力部署上重点强调西南防御，而从维护安全的基本路径选择看，其核心是如下三点。

（一）深化并“巧用”日美合作

在经历了“鸠山冲击”后，民主党政权已完全回归靠美路线。2010年11月横滨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期间，菅直人首相在日美峰会上“自上任以来最明确地表示要致力于日美双边关系”，称“在与中国和俄罗斯的问题上，美国能支持日本，我们感到非常高兴。我本人也认识到美国和美军的存在愈加重要”。日本官方人士解读称，这一番“坦率的言论”“意味着菅首相已经从鸠山前首相推进的‘对等的日美同

盟’明确地转向了‘同盟最优先’战略”。^① 2010 年，日美多次举行联合军演，特别是 12 月上旬，日本和美国军队在包括冲绳东部海域在内的日本周边海域和空域举行了为期八天的“利剑”军演。这是日美两国自 1986 年以来第十次举行联合实兵军事演习，而规模超过以往任何一次，是此前韩美联合军演的六倍。新《防卫计划大纲》强调，为了应对核威胁，美国的核威慑力量对日本不可或缺，日本需要与美国紧密合作来维持和提高核保护伞的可靠性。据报道，菅直人首相计划 2011 年春访美，与奥巴马共同发表“新同盟宣言”，就“改善地区和全球安全形势”提出新目标。

不过，较之过去自民党的相关政策，民主党政权对日美同盟的强化有其新意，并非简单“回归”：（1）强调对美自主性、独立性，反对“无原则地靠美”，强调同盟要为日本的国家利益服务，而不能为了维护同盟而牺牲掉国家利益。这一点并没有随着安全防卫政策的“转向”而消失。2010 年 11 月，民主党外交安全保障调查会就修订《防卫计划大纲》提出，鉴于朝鲜半岛局势不稳，应进一步加强日美同盟关系，但同时强调日本不应过于依赖美国。（2）强调更多、更巧妙地“用美”而不是“为美所用”。以军事技术合作开发为例，日本一方面利用美国这一“外压”推动“武器出口三原则”解禁，另一方面试图借助技术优势对美施加政治影响。据防卫省披露，2010 年秋季，日美在弹道导弹防御系统领域的第二个合作研发项目——“舰载型战斗指挥系统”软件，因为两国谈判无法达成妥协而叫停，背景是日本要求美国在向第三方提供该软件时，必须事先征得日方同意，但遭美方拒绝。^②（3）在安全领域对美“建议”、引导动作明显增多，反映了日本主动意识的增强。2011 年 2 月，在日方提议下，日美将原本在夏威夷进行的反导演习移师到日本周边，首次实地联合测试地区反导系统。另据防卫大臣北

① 「日米最優先ヘカジ」、『読売新聞』2010 年 11 月 14 日。

② 「弾道ミサイル防衛用ソフト 日米共同開発が頓挫」、『朝日新聞』2010 年 12 月 31 日。该军用软件由日美两国军民一体联合开发，可通过改良舰载电脑的显示器来提高宙斯盾舰的作战能力，还可在其系统出现故障时起到代替系统运转的功能。日美两国从 2006 年起一直在进行共同研究，原本计划从 2010 年起用六年时间在共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合作推进到联合研发阶段并完成试制品。日美自 2010 年春开始就向第三方提供该软件的条件进行谈判，但最终在秋季宣告破裂。

泽俊美透露，日方还在积极考虑从 2014 年起将日美联合开发、用于反导系统的“标准-3”向第三国出售，以减轻系统构建与维护的成本压力，并借以淡化日美在冲绳问题上的僵持局面。

（二）强化自主防卫能力

这是日本安全政策中最具成长性的一部分，包括“硬能力”和“软能力”两方面。前者包括军力建设、战力部署。新《防卫计划大纲》提出，构筑“动态防卫力量”即“具备适应性、机动性、灵活性、持续性以及多目的性，依照军事技术水平的动向，以高度技术能力和情报能力为支撑”的军事力量，以取代过去“必要而最低限度的基础防卫力量”；放弃过去的均衡方针部署，战列部署向有效监控、动态威慑及快速反应方向进行调整，强化西南岛屿的防卫态势与兵力部署。后者包括在政治、政策上放宽自我限制及完善情报、决策机制及指挥系统。

推动军工产业国际合作、发挥国际军事作用、主动塑造安全环境等，是强化日本自主防卫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防卫计划大纲》就此提出：通过参加“国际共同开发与生产”武器，在实现装备高性能化的同时，应对成本的上升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主流，日本将就应对这一重大变化的方略进行研究，从而为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铺平了道路；要研究修改“参加国际维和行动五原则”，更积极地参加各种国际维和行动。解禁军工产业国际合作，最终将使自卫队的装备水平大幅提高。据悉，菅内阁目前努力推动自卫队主力战机 F-15 后继机种的国际联合开发，同时也将潜艇、网络、太空等领域的联合开发纳入了视野。由于“武器出口三原则”的制约，日本迄今无法参与 F-2 战机后继机种之一——F-35 “闪电 II”的开发。今后如果能够参与 F-35 下一代机种的开发，那么将正好可以接替从 2020 年开始将陆续退役的 F-15。日本防卫省已于 2010 年 11 月 29 日宣布成立官民联合研究会，为放宽“武器出口三原则”限制、实际参与国际联合开发预作准备。

如果说，强化日美同盟是日本安全政策调整的显性主线，那么强化自主防卫能力则是一条隐性主线。这不仅源于民主党主流派的政治信念，也是出于对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大国多边关系的考量。尽管奥巴马政府对华牵制与平衡动作明显强化，但在大国利益深度互持的背景下，美国也深知“亚洲国家并不希望美国建立冷战式的反华军事联盟。对大

多数亚洲国家来说，中国都是它们最大的经济伙伴。它们从中国那里获得援助和贷款，而且与中国人也不存在大的政治分歧”。“就像许多对冲基金一样，美国对华也应该采取‘偏向多头策略’，也就是说应该把精力更多地放在与中国的接触上。因为就目前来看，相比与一个很可能即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国家展开新的长期冷战的策略，接触政策显然更为可取。”^①

尽管日美同盟目前处于“强化周期”，日本仍极为担心在中美日三角中被美国外交“越顶”，也担心在安全上美国为了自身利益而置日本的利益于不顾，担心美国的安全庇护并不可靠，而这一切都促使民主党主流派“强军自保”。实际上，奥巴马政府自入主白宫以来，提出“无核世界”目标，与俄罗斯启动新一轮核裁军谈判，《核态势评估报告》首次明确动用核武的条件，均对日本的心理及战略安全认知产生了极大震撼，担心核保护伞失效。日本政策研究界重量级人物佐藤行雄曾专门就此撰文，称“日本越来越担心美国（安全）保障的能力……如果美国政府单方面地重新定义核威慑的概念，在提供威慑方面降低对核武器的依赖，那么日本对美国延展威慑能力的担心会进一步上升”^②。

（三）推动亚太“民主国家”安全合作，构筑地区多边网络

新《防卫计划大纲》首次提出，要在亚太地区与拥有共同价值观和安全利益的韩国、澳大利亚及印度开展安全合作。此前，民主党发布的 2010 年度《防卫白皮书》、《外交蓝皮书》也对“加强与亚太民主国家合作”有所提及，组建“志同道合者同盟”无疑已成为日本安全战略的新“亮点”。

2008 年韩国李明博保守政权上台，奉行“亲美仇北”政策，为日本调整对韩政策、强化日韩安全关系提供了契机，民主党政权更有意将日韩合作作为地区安全战略的重点。2010 年 7 月美韩联合军演，日本自卫队首次以观察员身份参加。此后，菅直人首相、前原诚司外相相继发出在朝鲜半岛出现紧急态时将派自卫队赴韩解救在韩日本人、日

① 《不断崛起却又脆弱的中国》，《华盛顿邮报》2010 年 11 月 15 日。

② Yukio Satoh, “Reinforcing American Extended Deterrence for Japan: An Essential Step for Nuclear Disarmament”, The Association of Japanese Institutes of Strategic Studies (AJISS), 3 February 2009, <http://www.jiia.or.jp/en/commentary/200902/03-1.html>.

韩应建立安全同盟的惊人言论，反映了日方急于加强日韩安全合作的迫切心态。

日本的基本思路很清晰：借助日美同盟框架，分头强化与韩国、澳大利亚的安全合作。2010年下半年，自卫队分别与美韩、美澳军队秘密进行了不同军种的将官级战略磋商，这是美日澳、美日韩三国实战部队首次进行磋商，美日韩协商以陆海军为主，美日澳框架则以空军为重点。据《朝日新闻》2010年11月9日报道，日本已经开始与韩国就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进行磋商，该协定将对有关保护军事秘密的规则作出全面规定。据称，此举是为了应对朝鲜可能出现的非常事态，为日韩两国交换军事战略和相关情报铺路。日本迄今只与美国和北约签署了此类协定，而此次与韩国方面商签，标志着日韩安全合作将全面启动。同时，继2010年5月日澳签订《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ACSA）后，日本准备比照日澳标准，与韩国谋签日韩版 ACSA。

最值得关注的是，上述动向无不体现了民主党少壮派安保团队的形势认知与政策主张。日本在安全上需要应对两大战略变化：一是中国不仅国力上升而且对国际体系的影响力增大。应对中国崛起“远非一国力量所能独立完成，日本需要与美韩共同努力，联合美国的亚洲盟国，在这些框架内努力尽责”。二是美国国力与影响力相对下降，国际社会中一直由美国负责提供的“公共财”（Public Goods）由此削弱，日本等美国的盟国、友邦需要填补由此形成的空白。^①

（责任编辑：李璇夏）

① 長島昭久「アメリカの実像と日米同盟」、『外交』Vol. 2、時事通信出版局、2010年10月。